

戊戌百丰沉思丛书

戴逸 主编 张鸣 著

梦醒与嬗变

北京燕山出版社

戊戌百年沉思丛书

戴逸 主编

梦醒与嬗变

张鸣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醒与嬗变/张鸣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8

(戊戌百年沉思丛书/戴逸主编)

ISBN 7-5402-1119-9

I. 梦… II. 张… III. ①戊戌变法-研究②政治制度-研
究-中国-清后期 IV. K25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8416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安里 3 号 100031

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华孚商标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277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33.00 元

出版说明

今年，是戊戌变法 100 周年，为纪念中国近代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戊戌百年沉思丛书”。

戊戌变法是清末具有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后，在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清政府日渐腐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1895 年康有为等通过发动公车上书，掀开了变法图强运动的序幕。以后维新派在各地组织学会，设立学堂和报馆，宣传变法维新。1898 年 6 月，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的要求，颁《明定国是》上谕，并连续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的谕旨。变法历时三个多的时间，遭到以保守派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最后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距今已经 100 年，但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将永远载入史册。

100 年后的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与 100 年前相比，中国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正以新的腾飞迎接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历史没有如果，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胜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当我们翻开百年前的历史，戊戌变法的重大作用与深远影响，仍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尤其是站在时代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仍有着积极的意义。

时值戊戌百年，由《启蒙与呐喊》、《幻灭与新生》、《梦醒与嬗变》和《戊戌百日志》组成的“戊戌百年沉思丛书”将奉献给

读者。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并由著名近代史专家戴逸先生担任主编，由杨念群、黄兴涛两位先生对全书进行了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并致谢忱。

由于时间仓促，这套丛书无论从思想观点、内容叙述以及编辑质量方面，或许还存在着值得商榷与探讨之处和缺点、不足，尚希专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匡正。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7

前 言

百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相当悠远的时间区限，讳言说死，而称“百年之后”，祝愿婚姻久长说“百年好和”。百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活不到的年限，所谓“人生不满百”，“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百年也就成了时间久远的代名词。一件事情过了一百年，即使在节奏很慢的古代，也算是有历史的了，而一个事件过了一百年还会让人想起它，仅仅这年限就足以证明这个事件意义不同寻常。

戊戌维新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读书人很难忘怀的历史事件。没有打打杀杀的喧嚣，也没有应者云集的声势，但是戊戌维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却是居于前列的。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所面临最严峻也最迫切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没有出路，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就谈不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戊戌维新恰恰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

记得中国现代作家柳青曾经说过，人生的路虽然很漫长，但要紧处就是那么几步。其实，国家和民族也类似之。人走错关键的几步要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民族与国家也是一样，只不过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要远比个人历史长，所以还有机会在未来的岁月中加以弥补，当然，这得花费几倍的努力才行。

从表面上看，戊戌维新只是少数先进的士人仓猝登台又仓猝被撵下台的政治表演。但就是这短短103天的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国家的旗帜上写下了向西方学习，全面变革的口号。从

1840 年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的学说与见解，从来只是汉学、宋学的异音杂说，西学只有拾遗补缺的位置，经过维新运动一千人的奔走呼号，原来的潜流变成了浪花四溅的大波，从此以后，中国的学术大变，学风大变，思潮也大变。不仅抱残守缺的旧学黯然失色，就是“中学西源”这样的托词也没有了市场，虽然戊戌政变后的短暂的黑暗一时似乎像是要使河水倒流，但潮流毕竟还是向前涌进了。

戊戌维新是一次不成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虽然人们嘴上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毕竟更偏爱成功者的辉煌和欣赏凯歌行进的飞扬。不过对于想从历史中寻求教益者，失败者的足迹也许更有研究的价值。戊戌维新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恰在于它的失败。

戊戌维新给人们留下的不仅仅是惋惜和伤感，由于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自体性变革，这种变革对近代化进程而言，代价最小，震动最小，落后国家如果能通过这种方式走向近代化，尽管有“不彻底”和“改良主义”之诟，还是很合算的。然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幸运，变法很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它的种种举措，它的过程细节，都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思索。毕竟，我们中国人并没有在现代化的路上走完全程，当我们举目四望的时候，也许会发现我们走过的路程并不太长，不仅没有值得夸耀的资本，反而需要更高明的策略和更大的勇气，好让我们能走得更快一点。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我们今天的改革的性质与当年的戊戌维新已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在当年改革者的足迹中，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不少教益。比较起来，近代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没有像戊戌事件那样离我们今天的事业那样近。

史学界关于戊戌的著述已经很多了，在此，我不想再次描述戊戌变法的过程，重申已经让人说得絮烦的老调，只是想从政治

制度、现象和轨迹中，寻出几丝新意，如果寻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还值得一读，那么吾愿足矣。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政治格局之嬗变.....	(1)
一、清季政治传统：补丁机制.....	(2)
二、旗下闲人政治及其没落.....	(4)
三、晚清政治变局：枝强干弱的走向.....	(12)
四、洋务运动的地方导向.....	(22)
第二章 晚清士林的政治走向.....	(30)
一、明清之际士的传统政治角色.....	(32)
二、西学的萌芽与书院的悄变.....	(40)
三、分化中的士林与各自的政治动向.....	(47)
四、甲午前士林多数的躁动与迷惘.....	(53)
第三章 梦醒时分的政治动作与趋向.....	(62)
一、甲午震动，大变端倪.....	(63)
二、学习日本，东学之渐.....	(70)
三、知变的趋势，求变的开始.....	(76)
四、大梦之后的士林多数：无歧困羊.....	(81)
第四章 变法的政治曲线.....	(86)
一、变法的政治动员.....	(87)
二、变法同路人：洋务派问题.....	(96)
三、启蒙与变政.....	(110)
四、再世尼山与说经野狐.....	(129)
第五章 维新的陷阱.....	(141)
一、失重的中央政治架构：大太后与小皇帝.....	(142)

二、难产的交班：归政及其他·····	(153)
三、帝党与后党的界线·····	(157)
四、维新政治与道德陷阱·····	(161)
五、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	(169)
第六章 变法政治的无形之障·····	(176)
一、资历问题·····	(177)
二、补丁传统与求全之念·····	(182)
三、权力的合法性依据·····	(188)
四、老百姓眼中的“康党”·····	(196)
第七章 多难的中枢维新·····	(206)
一、机会之光透过了裂缝·····	(207)
二、维新路线：学俄与学日·····	(213)
三、明定国是的风波·····	(219)
四、建言之臣，顾问之功·····	(226)
五、替代：四小军机·····	(232)
六、冗政的威力：棉花套阵·····	(239)
七、权杖下的政变·····	(247)
第八章 西方政治的戊戌变奏曲·····	(256)
一、进化论与张三世·····	(259)
二、“物竞天择”与开民智·····	(263)
三、绅权与民权·····	(268)
四、议员和议郎·····	(275)
五、西式的开会与中式的清谈·····	(281)
六、上书言事与民主议政·····	(287)
第九章 戊戌遗下的政治课题·····	(296)
一、精简的沉滞·····	(296)
二、改革的次序·····	(312)
三、改革的权力悖论——从民主到专制·····	(317)

四、铨选的难题：科举与八股.....	(322)
结语与余话.....	(346)

第一章 晚清政治格局之嬗变

尽管清末以来，排满的革命家们将满人政权痛诋至一无是处，但平心而论满清还是蛮有特色的一代王朝，远的不比，至少比起相接的朱明，其政治实有凤鸭之别。究其由，并非清代制度比之明季有什么好处，而在于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两朝有很大的差别。清代之帝，不论贤与不肖，个个都有图治之心，说宵衣旰食固然是吹捧，但“君王从此不早朝”的事好像也没有。就更没有像明武宗那样自封“总兵”和明熹宗专事斧斤的胡闹帝王。更何况还出了两位放在何朝何代也堪称明君的康熙与乾隆，前后统治百多年。在人治政治模式的传统政治中，君主的明智与勤政显然比任何贤臣都更加有效。

虽然清朝政治颇有气象，但由于在制度上“清承明制”之故，几乎明代政治的明弊与隐疾，清代也都有，换言之，清代的政治格局与明代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无相权的皇权集权，以相互牵制为首要特征的中央政府机构，中央与地方外轻内重的布局，地方的简政与中央的繁政相搭配，缺乏效能的兵制等等大都大同而小异。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任何政治系统，只要能实现统治目标，就应该是合格的。自宋以降，在多数情形下中国封建统治者最关切的统治目标是对国家的控制，消解内部的叛离，至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繁荣则是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事。行政效率的低下与国家机器的腐败，往往能换取皇权的稳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看来的所谓政治系统的弊病，很可能是一种

统治所必需的合理代价。只是，这种代价在政治体系运作过程中会逐渐累加，一直大到足以损伤整个系统。而晚清政治格局的嬗变，就是在这种代价累加到了一定程度，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的刺激而发生的。政治重心由内重外轻转为外重内轻，新兴的湘淮军制部分弥补了传统兵制的怠滞，从而使清代政治呈现出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虽不足以抗击西方的冲击，但已可延缓其寿命。

一、清季政治传统：补丁机制

中国进入明清，以史家的公论，是进入了衰落期，统治方面无论是制度还是经验手段都过分的致密而烦琐，政治目标体系中保守主义倾向加重，过分地强调政治稳定，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任何可能的动荡乃至波动。相较而言，清代比明代这方面的特征更明显。

清季统治者似乎比前朝更加讲究“祖制”，或许是清代祖先的文治武功，或许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有谨慎，总而言之，清朝统治者心目中的“祖制”有着近乎神圣的意味。日常事务，以循行祖制为常式，但凡一政策出台，合于祖制则理直气粗，不合则躲躲闪闪，有时明明是新举措，也偏要打着祖制的招牌。像晚清祺祥政变以后，西太后那拉氏与恭亲王奕訢联手，为了遮人耳目，混淆视听，故意给奕訢以实际上已经废置了一百多年的议政王称号，来陪衬她的“垂帘”，即让祖制上有的“议政王”掩着祖制上没有的“太后垂帘”。

但是，看重祖制的清代政治还远远谈不上像我们一般作为常识公认的那样是僵化的，它在适应情势变化方面，还是具有弹性的，而且在清代的多数时间里，能够应付统治的需要。清代政治在其运作过程中，衍生出一种“补丁机制”，即在原有的政治要素或政策不再能应付局面，或者为统治者所不喜时，用某种“补

丁”政策和要素来修补之，并不去掉旧的。道光帝对此曾有段佳妙的议论，他说：“譬如人家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1〕}这种“补丁机制”运行起来有两种情况，通俗点说，就是一种补丁小，一种补丁大。不论补丁大小，要的就是补得“整齐”，面上光。

前一种情况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是清代的财赋政策。清代中晚期，社会动荡加剧，军费开支陡增，囿于赋税不增的祖制，尽管军情火急决没有人再敢在国家日常赋税上打主意，于是只好开捐，最后又加上厘金征收，尽管捐额与厘金比例越来越大，但比起国家常税，它还是一种小补丁。又如总理衙门的设立，尽管不仅弥补了原政府机构欠缺的外交职能，而且凡有洋务之处，无不插手，事实上侵犯了原有六部职权领域，但比起原来庞大的政府机构来，它承负的行政功能还是要少。

属于大补丁的情况相当多，像内阁之于议政处，军机处之于内阁，前者虽然没有撤销，但职能均为后者抽空，成为名符其实的“闲衙”。再有像以湘、淮军为首的勇营之于八旗与绿营，以及后来的新建陆军，递次相补，国家正规军的位置先是由勇营挤走了八旗绿营，而后新军又挤走了勇营，但直到清朝覆灭时，八旗与绿营仍在苟延残喘。又如官俸，清承明制，实行低俸禄制，正七品的知县，年俸45两，四品知府105两，巡抚与总督，贵为封疆大吏，也不过155两和180两（乾隆时米价，每两不过买一石米多一点）。明知这点官俸根本不够养家活口，却不肯加增，开始默认官吏在耗羨上打主意，后来则添加高出俸禄百倍的养廉银。最典型的莫过于漕政，漕运在晚清由河运改为海运之后，河漕的一整套机构无事可做，但一直摆在那里，戊戌变法时好容易要撤了，

〔1〕 张集馨：《道成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第89页。

没几天又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下，补丁有时已经大过了它所补的东西。事实上是听任原有的东西自我萎缩，自生自灭。

清代政治这种自我调节的修补功能，虽然能满足政治变革的部分需要，也确有减少政治震荡的好处，甚至面对西方的冲击，也能作出相应（虽然很笨拙）的反应。但是，修补一旦成为一种政治惯性或者传统，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治缺乏活力，为因循、守旧提供堂而皇之的栖息地。当步入近代面临近代化和对付西方侵略这双重课题时，修补功能就愈发力不从心，机构的叠床架屋，政策的混乱重复，使得行政效率更加低下，随着西方侵略的深入和近代化任务的日重，这种修补政策实际上已经走上末路穷途。可惜的是长期的修补传统在人们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因循迟滞，得过且过的惯性，和对彻底变革的本能排拒，以及以新补旧的操作定势。这样，人们在进行大规模变革的时候，其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就显得格外的厚重。李鸿章在晚年曾不无自嘲地称自己是个于事无大补的裱糊匠。不错，李鸿章给清王朝这座风雨飘摇的大厦裱上了淮军和北洋水师，裱上了洋务企业和几个半洋的学堂，可急风骤雨一来，依旧房倒屋坏，补丁毕竟只是补丁。

二、旗下闲人政治及其没落

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满人是统治民族，自然拥有不言而喻的地位和特权。清末的反清志士们，将满人对汉人的民族压迫渲染得非常吓人，其实“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满清入关之初，八旗铁骑横扫华夏之时，对汉人的杀戮、欺凌与压迫的确堪称是残酷的，“扬州十日”、“嘉定之屠”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再加上圈地的豪夺，“逃人法”的暴虐，说是令人发指也并不过分。但是经过清代盛时长达百余年有意为之的文化融合与政治上的掩饰，满汉矛盾已经渐趋缓和，满人虽有特权，但活动却被尽可能地限

制了，也可以说是尽可能地与汉人生活隔离开了，所以一般老百姓对满人压迫的感觉并不那么直接，以清末刺杀五大臣而闻名的反清斗士吴樾，在自述中就承认他在接受革命宣传之前，对满汉之分毫无感觉。

当然，说满人压迫“不若是之甚”，并不是说这种压迫不存在，终清之世，满人的特权和满汉在政治、法律上的不平等始终存在。而且尽管汉人参政的份额不断加增，但至少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中国政治的重心在满不在汉。只是当初赋予满人特权、给予满人种种优待的清朝帝王所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的种种给予在历史发展中反而成了满人的一种甜蜜的桎梏，不仅使他们在生活上丧失自理自存的能力，而且在政治上日见其低能。

自从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编为四旗，而后是八旗以来，满人逐渐赢得了旗人或旗下人的称谓（也包含少部分汉军和蒙军旗人）。八旗制度从其主导方向说，应该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但这种制度决非只有军事上的意义，前辈清史专家郑天挺的看法是颇有道理的，他说：“八旗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呢？有人认为八旗制度是军队制度，实际它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制度，有人说是户籍制度，其实它也不单纯是户籍制度。因为它还有应尽的其他义务和应享的其他权利。可以说这是在民族联盟的残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阶梯统治，它是满人入关前的政治制度。”〔1〕应该说，八旗制度也是旗人介入政治的一种媒介和渠道。由于八旗制度所特有的氏族残余性质的军事民主体味，旗下政治在满清未入关之前主要表现为旗下人较为普遍的议政与参政，在上层表现为八贝勒共议国政，连诸贝勒与汗（皇太极）相见之礼居然是他们“各至汗前，依次抱见。”〔2〕在中下层则表现为各旗内部的相对自

〔1〕 郑天挺：《清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29页。

〔2〕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第885页。

治和甲喇、牛录及披甲人对各自事务的发言权。这在游牧、半游牧的氏族军事民主制度中是常见的情况（八旗是由原来极民主的穆昆塔坦制度发展而成的）。

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从皇太极开始，清朝皇帝制度汉化的最大敌人，就是八旗的议政制度与传统。不言而喻，这场较量皇权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顺治应该说不算是位很热心汉化的皇帝，但突然发病身死的他，身后却冒出来一个痛悔自家“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1〕}即后悔汉化太快的“遗诏”。显然，这是满人元老意志的体现。实际上是旗下政治传统对制度汉化的反弹。康熙时，辅政大臣鳌拜在小皇帝面前还敢“攘拳咆哮”，抗旨不遵，把这种现象说成是鳌拜有不臣之心其实是后来的诛心之论，说穿了不过是满人军事民主传统的孑遗而已。直到雍正继位，满人入关已历半个世纪，他还接二连三地采取措施削弱八旗旗主的地位，往八旗各派御史二员，“稽察八旗一应事务”，改八旗都统在“私家办事”为“俱于公所办事”。^{〔2〕}并将八旗都统的印信“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把旗主的意思抹掉。这说明，直到这时，八旗各旗自治的遗风犹存。

当然，满清入关以后，旗下政治还是发生了较为根本性的变化。八旗原有意义上的“议政”传统在帝王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打击下的确逐渐消亡了，但旗人对国政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却没有也不可能消失，用康熙的话来说，“满洲乃国家根本”，醉心集权的清初诸帝，一方面伸出拳去打击旗下政治对皇权的干预，一方

〔1〕《清世祖实录》，卷144，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2〕《清世宗实录》，卷9，雍正元年七月癸巳。